

# 国家形象建构:作为表征 意指实践的“文化循环”<sup>\*</sup>

刘丹凌

**摘要** 本文借助传播符号学理论,围绕表征符号及其意指实践,研究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国家形象的建构是表征以及由表征聚合而成的“表征链”之合谋,是表征符号及其意义叠加、聚合、更迭和变化的产物。多元的国家形象表征裹挟着多元的意识形态内涵,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形象表征及其意识形态内涵都是显在、清晰、平衡的,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也可以相互矛盾甚至竞争,契合主流价值、时代主题、文化惯习和公众期待的国家形象表征可能得到放大和凸显。

**关键词** 国家形象;表征;符码;构成主义;文化循环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6)04-0106-07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04.015

**作者简介** 刘丹凌,西南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后 重庆 400715

20世纪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把认识论意义上的表征概念拓展为泛文化实践意义上的表征概念。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的确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的使用”<sup>①</sup>;约翰·费斯克将表征(representation)视为“制造符号以代表其意义的过程与产物”<sup>②</sup>。从客体形象到媒介形象,再到认知形象,国家形象的建构是复杂的表征意指实践过程,是纷乱的初级“源像”演化为典型的抽象形象之过程。

## 一、构成主义:理解国家形象建构的基本途径

在霍尔看来,经由语言<sup>③</sup>表征意义的运作有三种阐释途径:一是反映论途径,这种阐释认为意义本身就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客体、人、观念或事件当中,语言犹如一面镜子,只是映照出它们“本

来”的意义、“真实”的意义。按照这种理路,国家形象的客体状态,亦即其物质的、自然的属性决定着国家的总体构造和意义生成,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国家的客体形象决定其媒介形象和认知形象,国家的媒介形象和认知形象是其实体形象意义的描摹和表达。这显然是一种机械的唯物反映论。事实上,语言符号与它们所指的事物并不能完全对等,尽管某些符号可能与它们所表征的客体在外表和质感上具有某些相似性,尤其是视觉符号;但是,语言符号和现实客体之间不是简单的反映、模仿,或是一一对指称关系,语言符号可以意指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现实世界本身,包括想像、虚构和观念的世界。同时,现实世界自身也难以呈现出某种超越物质层面的观念和情感等,因此意义生成并不是客体自身意义被发现的简单线性过程。

国家形象本身即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并不是单一的、明确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某种形状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影像传播与中国形象研究”(10BXW017)的阶段性成果。

或概貌。单就国家的客体形象而言,它包含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内涵——一方面,疆域、人口、物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军事、科技等实际成果呈现为它的物质样态;另一方面,国家及公民的行为特征、社会政治及经济制度、民族性格、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文化艺术、价值理念等呈现为它的精神样貌。因此,从“源像”开始,国家形象就不具有清晰、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而始终处于一种多面相、多内容、多形式和多变化的混沌状态之中,更毋宁说国家的媒介形象和认知形象了。总之,国家形象既不是单纯的具象存在,也不是单纯的抽象精神,是具象与抽象的综合体。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一系列概念的组织、集束、安排、整合,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复杂联系来共同形构,而无法通过“源像”的自我阐明来实现。

二是意向性途径,这种阐释认为,说者、作者通过语言把他们的独特意义强加给人们,也就是说,语言符号包含着信息发出者赋予它们的特定意义。这无疑切中了表征的一要害——表征的过程也是意见、观念形成、传播和接受的过程。如果按照这种途径来推论,那么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媒介形象的塑造者对它的赋意。显然,这种阐释的缺陷在于将意义的来源绝对化、单一化,因为表达者并非符码意义的唯一或独特来源,个体的意向、观念必须进入语言的规则、信码和惯例当中才能被共享和理解。并且,意义的最终生成还取决于信息接受者、语境等多重因素。所以,尽管国家媒介形象的塑造者、表达者之主观赋义影响着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三是构成主义途径,这种阐释认为事物本身和语言的个别使用者均不能确定语言的意义。事物并不呈现明晰的意义,而是“我们”构建了意义,这个意义缔构过程借重的是各种表征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转向”最大的理论贡献:与其说意义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意义是生产的,或者说是“建构”的。构成主义并不否定物质世界的存在,但是他们认为传递意义的不是物质世界,而是我们用来表征各种概念的语言系统等等。正是社会的行动者们使用

他们文化的、语言的各种概念系统以及其他表征系统去建构意义,使世界富有意义并向他人传递有关这个世界的丰富意义。<sup>④</sup>换句话说,“表征”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物”的建构过程,“在形成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和物质‘基础’,它已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反映。”<sup>⑤</sup>

这为我们理解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新的视野——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表征意指实践过程,即杜盖伊、霍尔所谓“文化的循环”<sup>⑥</sup>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既是形象、状态、样貌的表达与接受之过程,亦是意义的输出和意义的解读之过程,涉及概念、观念,更涉及情感、情绪、态度、意愿和归属感,等等;其核心是意义的生产、意义的传播、意义的解读和接受,以及意义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反应等一系列过程之综合;其影响不仅在于对公众头脑和心理的作用,还在于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从而产生实际的社会后果。在“文化的循环”的动态链条当中,意义的输出和生成错综复杂,存在于不同的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传媒节点“意义还通过种种不同的传媒生产出来,尤其是目前,通过复杂的技术,通过现代大众传媒这种全球通讯手段生产出来,这使得意义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文化之间循环起来……”<sup>⑦</sup>尤其对于国家形象而言,其意义缔造更依赖于媒介表征——公众主要通过媒介信息、媒介形象来认知和理解国家形象,并完成认知意义上的国家形象构建。媒介如何抒写、如何表达、如何通过媒介语言体现出某些“意味”和“内涵”,即媒介如何通过“表征系统”为受众提供国家形象的认知和解释符码以及框架,将影响公众对国家形象的阐释、想象和赋意。

## 二、表征链: 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

国家形象的建构不是单一表征运作的结果,而是一系列表征意指实践的过程,是国家形象表征链聚合并实现意义表达和认同的过程。索绪尔的“聚合链”思想可以为我们分析国家形象的表征链提供帮助。作为符号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有两个重要的发现:一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sup>⑧</sup>,也就是说,符号的物质形象与它所指称的意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二是符号意义的关联性,语言符号的意义既不是由现实事物或经验决定的,也不是由符号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符号“聚合链”来决定的。具有意义关联性的符号群集形成了符号“聚合链”,某一符号的确切意义取决于它在这个链条上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在一个句子中,“聚合链”上的符号可以相互替换,虽然替换后句子的具体内容有所改变,但语言的功能与结构关系不会改变。<sup>⑨</sup>

国家形象表征链不是理性规约的产物,而是社会文化实践的形构,是表征符码在反复使用和阐释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意义互涉和功能关联:正是人们惯例性的使用符码(对符码的选择、替换、理解)以及使用者对符码意义的固定反映等<sup>⑩</sup>,最终形成意义相对明确、固定的表征链。同一国家形象表征链上的符码本身是形态各异的,但它们相互关联、相互指涉、相互印证,共同作用于特定国家形象意义的生产。比如,京剧、汉字、丝绸、武术、孔子学院、兵马俑等等符码可以聚合为一条特定的国家形象表征链,彰显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形象内涵。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循环”形式和表征意指实践过程,国家形象表征链的构成特征有三:

首先,具有代表性的表征符码构成了国家形象的“表征链”。符码的代表性主要源自符码的普遍性。“普遍的东西是属于每个人的东西”<sup>⑪</sup>,那些被广泛接受、能引起普遍联想的表征符码被挑选作为国家形象的典型符码,其普遍性价值在于这些符码浓缩了意识形态观念、时代主题、文化惯习和公众期待等,比如,中国龙、汉字、长城对人们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它们代表着中国悠久的历史、绵延的文化,已获得社会个体和集体的普遍接受。

普遍性越高的表征符码,代表性越强,越处于国家形象表征链中的突出位置,被采用的次数越频繁,范围越广泛。比如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大眼睛”女孩苏明娟。1991年5月,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到安徽金寨县采访,张湾小学7

岁的苏明娟进入他的镜头,照片以“我要读书”为题刊发。照片中的苏明娟手握铅笔、大大的眼睛直视前方,流露出强烈而炽热的渴望,这种渴望是贫困地区少年儿童对知识的渴望,对学校教育的渴望,也是身处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中国人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因此,苏明娟和她眼神中的渴望就不再限于个体诉求,而是代表了一种普遍性的中国渴望。“大眼睛”照片就此成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形象,广为流传。其实,中国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言人还有“大鼻涕”胡善辉(流着鼻涕大声朗读的山村小学生)以及“小光头”张天义(一双忧伤又无奈的眼睛,从安徽来到无锡的农民工孩子),他们的形象也曾被广泛传播,但是影响却远不及“大眼睛”苏明娟。对比这三幅照片,可以发现,后两张照片只是单纯展现了贫困地区乡村孩子上学的艰辛,而“大眼睛”女孩形象表达的不止是读书的艰难,还有渴望,而她的渴望唤起的也不止是理解和同情,更多是共鸣。因此,相比“大鼻涕”“小光头”,“大眼睛”具有更高的普遍性。

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类似“大眼睛”这样的代表性表征符码,而一个符码成为代表性符码,是该符码不断“普遍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借助中国高铁形象来说明这一问题。2008年4月,中国开通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铁,在媒体报道中高铁代表着一种新的交通工具。不久,中国高铁遍地开花、连贯东西,从2013年开始,中国政府多次向国外推介中国高铁技术,高铁形象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形象的新符码。2014年1月10日,中国第1000列高速动车组出厂,《人民日报》在一版重要位置刊发新闻照片<sup>⑫</sup>;201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在一版版心位置用大幅图片报道“中国承建土耳其高铁项目收官”<sup>⑬</sup>;2014年2月3日,纽约时报广场的电子大屏幕播放了中国高铁广告。截止2015年,中央电视台官网,有关中国高铁的视频新闻达1000余条,中国高铁成为彰显中国发展成就的典型形象符码。中国高铁从最初含义单一的交通工具符码,逐步演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符码,进而演变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形象之表征。

其次,国家形象“表征链”的定型化亦是国家形象类型化的过程。国家形象表征的定型化,使得人们更容易把握、理解和记忆国家形象。在不同的媒介表达及公众认知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形象。就中国而言,至少我们可以发现主流政治视域中的“责任大国形象”、平民生活视域中的“草根中国形象”、精英文化视域中的“文化中国形象”、边缘文化视域中的“异样中国形象”、消费文化视域中的“俗中国形象”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形象。这些类型化的国家形象正是某些国家形象表征链定型化的结果。理查德·戴尔认为“一种类型就是任何一种简单的、生动的、记得住的、易于捕获的和广为认可的个性化,在其中少数特征被预设,而且变化或‘发展’被减少到最小程度。”<sup>⑩</sup>定型化其实质就是将少数“简单的、生动的、记得住的、易于捕获的和广为认可的”表征链定型固化的过程,生产一种阐释“框架”,使之成为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意义载体。按照霍尔对“定型化”特征的理解,国家形象表征链的定型化至少包含两个要点:

其一,国家形象表征链的定型化是简化、提炼“差异”,并使“差异”固定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差异”,也就是事物的特殊性,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属性。正是“差异”让事物成其为自身,并且,“差异”越鲜明,事物越易于辨识。这个使“差异”固定化的过程包括三个环节:首先,特定国家形象表征链中那些鲜明、生动、易于记忆和捕捉的表征符码不断“标出”自身,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普泛的接受,比如图腾、国旗、文物、名人脸庞、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等等;其次,在反复的呈现、使用、阐释和再阐释过程中,这些特定国家形象表征链中的符码沉淀了相对稳定的象征性主题,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等——中国画、汉字、编钟、青铜器、飞天等表征符码就沉淀了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题;再次,特定国家形象表征链所指涉的象征性主题被抽象和简化为最能彰显其本质特征的意义内核,比如民主的政治制度、发达的经济、璀璨的文化、悠久的历史等等。国家形象表征链的简化和差异化有助于特定国家形象意义的表达和接受。《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由

于想表达的要素太多,致使内容过于庞杂、不精炼,效果不尽人意。<sup>⑪</sup>其中“人物篇”想通过中国各领域的名人来展现中国的“了不起”,然而50多位表情各异的中国名人不断闪现,反而给受众一种压迫感;在“角度篇”中,由于设置主题太多、内容太繁复,难于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商务部在欧美投放的《中国制造宣传片》(2009年)采取了与《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不同的手法,它对繁复的内容不断简化、提炼,最后通过建构五组意义相似的生活画面集中表现“携手中国制造”这一主题,收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其二,国家形象表征链的定型化是通过“排他性”实践建立类型边界的过程。表征链定型化的实质在于通过对表征符码的价值评判,保留适合的并排除不适合的表征符码。这一边界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建立起符码的分界线,分清哪些符码“可采用”“不宜采用”或“坚决不能用”,哪些是“正常”和“不正常”,哪些是“可涉及”和“禁止涉及”,等等。这些分界线相当于给符码贴上“保留”或“排除”的标签,虽然一些符码被“排除”,却保证了维持社会正常交流的“符号秩序”。这些分界线作为硬性的操作规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效果。比如在主流政治视域国家形象的塑造中,《人民日报》是非常特殊的媒体机构,作为政党的“喉舌”,它对选择什么样的影像和话语,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包括选择哪些照片上一版、哪些放大处理、哪些信息该突显或删除等,其符码分界线经过层层设计体现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而消费文化视域中的“俗中国形象”塑造过程中,我们看到那些豪华住宅、摩登都市、奢侈宴会、华丽外表总是被彰显、放大;肮脏的城市街道、衣衫不整的行人、简陋的棚户区等影像被彻底排除了,契合了庸俗、享乐的消费主义价值观。

再次,国家形象表征链是“历史性”符码和“当下性”符码的复杂聚合。根据产生时间的差异,可以简单地将国家形象的表征符码区分为“历史性”符码和“当下性”符码,前者主要指那些产生于过去、于当下仍有意义的表征符码;后者指产生于当下的新表征符码。“当下性”这一概念来自于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等学者

在批评实践中倡导的“批判性当下论”<sup>⑩</sup>。“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下”是过去和将来的汇聚点，“当下论扎根于此时此地，同此时此地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主动寻找，可以突出和利用这种联系，以之为第一原则。”<sup>⑪</sup>特定国家形象表征链的符码不全是“当下性”符码，因为，“当下性”符码由于其“新鲜”性可能导致理解和传播的困难；但也不全是“历史性”符码，因为，国家形象的表征链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化更迭的。所以，国家形象表征链是“历史性”符码和“当下性”符码的聚合。

一方面，“当下性”符码是国家形象表征链的重要组构。“当下性”符码常常被注入特定国家形象的表征链中，由于其“新鲜性”“时代性”，它们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共鸣，刺激人们的联想和认同。“历史性”符码可能在时代的变迁中丧失原有的“象征活力”和“联想刺激力”，或者在反复的使用中让人们产生审美疲劳抑或麻木感，从而被排挤到表征链的边缘位置，甚至被覆盖、替代。但是，新符码也可能在反复的使用中消耗掉其“当下价值”，从而丧失它在表征链中的优势地位。自徐海峰取得第一枚奥运金牌，体育明星成为中国体育强国形象“表征链”中不断延展的符码。2013年，获得世界网球冠军的李娜也进入这一表征链条，成为中国体育强国形象的重要符码。从2013年1月至2014年7月，李娜的照片四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一版。很显然，李娜的媒介形象取代了其他体育明星占据了表征链的重要位置。

另一方面，“历史性”符码也常常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被赋予“当下”含义。具体的情况有二：一是对“历史性”符码进行“当下性”改写。对国家形象表征符码的改写是一次新的创造，它不是彻底再造一个新形象，而是通过局部的修改发挥符码新的意识形态功能<sup>⑫</sup>。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展馆设置了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1068名普通市民构成了一幅场面巨大、鲜活的市井生活画面，有吆喝的商贩、唱号子的船户，还有酒楼上的觥筹交错……这是对《清明上河图》进行的一次“当下性”改写，它再现了中国昔日的繁荣以及

人们的和谐生活，更寓意了中国当下的繁荣与昌盛。龙亦是中国形象的典型表征符码，《时代周刊》等西方媒体曾经多次调用和修改龙的形象，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新认识和新态度，比如凶悍的龙、红色的龙。二是“历史性”符码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调用。“历史性”表征符码为人们理解、建构国家形象提供了文化视野，对“当下性”符码的阐释不能脱离“历史性”符码，正如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所告诉我们的，先前的观念是理解后来观念的基础。比如，在塑造近代灾难深重的中国形象中，甲午海战的影像一再被调用，历史的再现不是为了再诉说，而是为理解当下奠定基础。在众多文化记忆中，“历史性”表征符码作为“延续的场景”不断发挥这一基础性作用。

### 三、国家形象的表征与意识形态的勾连

国家形象的建构也是一个意识形态中介表征符码生产意义的过程，费斯克把表征视为“将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纳入具体形式（也就是说，不同的能指）的过程”<sup>⑬</sup>。按照雷蒙·威廉斯分析，意识形态有三种主要用法：一是某一特定阶级或群体的信仰体系；二是虚假的信仰体系——错误的思想或者错误的意识——与真正的或者科学的知识相冲突；三是意义和思想产生的一般过程。<sup>⑭</sup>在费斯克看来，这三种用法并不必然矛盾，而是有如中国的锦盒套，用法一套在用法二之中，用法二套在用法三之中。<sup>⑮</sup>也就是说，宽泛来讲，意识形态可以被描述为意义的社会生产。而意义的社会生产也是国家形象建构的核心要义，因为国家形象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范例起作用的，它既是社会个体与群体关于国家观念、价值的表达与认知，亦是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与评判，关系着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系。那么，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个怎样的意识形态运作过程呢？

一方面，国家形象表征符码赋予特定意识形态具体的形式，由此来支持它所蕴含的迷思及价值观并使其公共化。比如影像文本中广袤的土地、壮丽的山河、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摩登的城市、新农村等表征符码将作为“大国”的中国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其背后隐含的是主流政治视域

中关于“发展了的中国”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国家形象表征符码的意识形态内涵有三种呈现方式。一是直接表达,这是主流政治媒体惯用的方式,即一种“宣传型”国家形象表征符码,比如有关“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益宣传。二是意识形态“化妆”为一种文化价值,巧妙植入国家形象的表征,意识形态观念无声地“编码”于媒介文本,可以视之为“普遍型”国家形象表征符码。这是典型的“隐性国家形象”策略,为增强国家形象的说服力、吸引力,媒体通常采取这一方式塑造国家形象。三是意识形态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镶嵌”或粘附于国家形象表征符码中,相当于一种“艺术型”国家形象表征符码。詹姆斯·罗尔视之为“潜意识的劝导”,是一种“低于意识层面的暗示”<sup>②</sup>,“我们在全然不知,或未能以一种理性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就被这些信息所影响”<sup>③</sup>。一些精英文化抑或边缘文化常常通过这种“潜意识”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詹姆逊透过电影《大鲨鱼》讨论了“美国形象”的问题,他指出,影片所投射的人物关系“可以从社会和政治上具体加以说明,把它作为法律和秩序与新的跨国公司的技术统治联盟的寓言:这种联盟一定要强化,不仅通过它幻想的对误以为是鲨鱼威胁的胜利,而且首先通过一种不可或缺的前提,即取消那种更传统的旧美国形象,在新的权力体制运行之前彻底把它清除出历史意识和社会记忆。”<sup>④</sup>

另一方面,国家形象表征符码在相互的勾连和印证中发挥文化认同功能。也就是说,它们使文化成员通过接受共同的迷思和价值观念来确认其身份和位置,更确切地说,基于文化成员对特定国家形象表征符码及其隐含意和迷思的使用、接受和回应,意识形态将他们建构为特定视域中的特定成员。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其重要作用在于建立“共识”,“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而且还是一种双重反射的结构:这种镜像复制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并且保障着意识形态发挥功能。这意味着所有意识形态都有一个中心,

意味着绝对主体占据着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位置,并围绕这个中心,用双重镜像关系把无数个体传唤为主体。”<sup>⑤</sup>国家形象的表征实际上是围绕“意识形态中心”形成的符码体系及其意指过程,无论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者还是接受者,在对这些符码的运用过程中,不断被意识形态所塑造,无形中生产着“社会认同”。正如费斯克所言“通过运用符号,我们保持了意识形态并赋予其生命,但同时我们也被意识形态、被我们对意识形态符号的反应所塑造。符号在使迷思和价值公共化的同时,也使它们能发挥文化认同的功能。”<sup>⑥</sup>

注:

- ①④⑩【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24—26、260页。
- ②【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 ③斯图尔特·霍尔在这里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语言”一词,将语言视作符号系统,包括声响、形象、书写语言、绘画、照片等等。
- ⑤⑥⑦【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导言第6、1、3页。
- ⑧⑨【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0、176页。
- ⑩费斯克认为“惯例是符号的社会维度。它是使用者之间对符号恰当使用和反应的一种协定。如果没有社会惯例的维度,那么符号就仅仅是私人的,不能同于传播。”【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 ⑪【美】朱迪斯·巴特勒【英】欧内斯特·拉克劳【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高信奇、蒋桂琴、董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 ⑫宋学春《中国第1000列高速动车组出厂》,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10日。
- ⑬陆娅楠《高铁“走出去”交出首份成绩单——中国承建土耳其高铁项目收官》,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18日。
- ⑭《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在纽约时报大型电子屏播出后,研究人员调查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对中国持好感的美国人从29%上升至36%,上升7个百分点;而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者,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51%。“很多人说,看了这个广告很紧张,第一个想法是:中国人来了,而且来了这么多。”孔璞《商务部在欧美投放“中国制造”广告》,载《新京报》2011年11月16日。
- ⑯⑰【英】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文学文化理论导论》杨建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291页。
- ⑱杜赞奇对中国关帝形象的历史性变迁的分析,阐述了“复刻”

这一形象所发挥的文化政治效果。参见【美】杜赞奇《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陈仲丹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3页。

①【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②①②【美】约翰·费斯克《过程与符号：传播研究导论》（第二版）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138—139、143页。

②③【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

途径》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42页。

④【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可见的签名》王逢振、余莉、陈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⑤【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下）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页。

（责任编辑：御 风）

##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Culture Circulation of Representations' Signifying Practices

*Liu Danling*

**Abstract:** This thesis makes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national image's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emeiology theory, focusing on representation codes and its signifying practices. The national image is constructed by representations and representation chains, in which different codes and their meaning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Different national image representations have different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However, not all the national image representations are clear and balanced, since they are in a mutual complementation and mutual contradiction pattern. The representations which correspond to mainstream value, theme of the times, culture habits and public expectations may be amplified and highlighted.

**Key words:** national image; representation; code; constructivism; culture circulation

（上接第84页）

## The Research on Trans-regional 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System about Interest Coordination

*Wang Weiquan*

**Abstract:** The trans-regional 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is based on the externality of air pollution for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e interest coordination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pollution governance. 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system on interest coordination have thes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diversity of subjective, the complexity of object, and opportunism. During the progress of China's 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i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im to governance the air poll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function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and restructure organization. The ecological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mechanism of interest coordination should be innovated and enforced. It is important to build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model.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trans-regional governance; interest coordination